

编者语:对儿童文学进行多维度研究,有利于为儿童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方位的思考和参考。本期栏目所选四篇文章,涉及对20世纪儿童文学的特征研究、高校儿童文学的教学现状研究、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评述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吴其南之文从四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在现代性文化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反现代化现象;韩庆艳之文分析了当下高师院校儿童文学教学的实效情况和高校儿童文学教学实效性弱的内外原因,从而提出了提升高师院校儿童文学教学实效性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李丽之文对王泉根儿童文学文论集《担当与建构——王泉根文论集》众多观点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评价;张瑞之文借用现代西方哲学中主体间性概念,论及中国台湾当代童话作家孙晴峰童话的创作特色,分析了其童话中间性意识的表现形态和具体内涵,以及作家的创作意识在童话审美理想方面的价值意义。

反抗现代化

——20世纪儿童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吴其南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和成人文学一样,现代性也是20世纪儿童文学的基本内涵。只是由于表现对象等的不同,儿童文学中现代性常常以反现代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或以儿童的纯洁精神批判现代社会的人性陷落;或以荒野文化反抗园艺文化;或以唤神精神反抗祛魅化。这种表现现代性的方式深化了儿童文学,也使儿童文学带上较多的成人化倾向。

关键词:儿童文学;现代性;反现代化;荒野文化;园艺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5)05-0001-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5.05.001

Fighting against Modernization: A Manifestation of the Modernity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WU Qi-n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Zhejiang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Just like adult's literature, modernity is the basic connotation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s of the objects, the modernit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often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anti-modernization; the pure spirit of children against the degeneracy of human nature, wilderness culture against gardening culture; reenchantment against disenchantment etc. Such performances of modernity deepe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make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more adultification.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modernity; anti-modernization; wilderness culture; gardening culture

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内涵,这在儿童文学中不仅不例外,有时还表现得格外醒目,因为儿童文学作为一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无论是对较具实体的未来社会、未来民族、未来

国家形态的想象,还是在现代意识的层面参与对大众特别是对儿童的现代化启蒙,儿童文学大体上都与成人文学采取同一步调,反映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只是,由于面对的读者对象不同,

收稿日期:2015-05-03

作者简介:吴其南(1945—),男,浙江安吉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

作品的描写对象及表现的主题不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有些差别。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常常以反现代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一、以儿童的清洁精神批判现代社会的人性陷落

儿童文学中,或者说自古以来以儿童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中,以儿童的清洁精神批判成人社会的精神陷落,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审美视角,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一视角不仅没有消失还获得了新的动力。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简单落后,生产单位小,人们的生活空间也小,小得使人极易产生自己能把握自己命运的错觉。由此产生社会组织上的宗法性,家族成了社会结构中的最主要元素。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维系纽带,社会关系和生物性的血缘关系融为一体,成为体现中国人天人合一哲学观的深层基础,超级稳定也超级保守,能窒息任何新思想的火花却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现代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现代经济是流动性的商品经济,进行现代生产和现代商品交易时,人被卷进了滚滚的“物流”,被冰冷的“物”带着,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着,仿佛又陷入无物之阵。车水马龙的都市代替了炊烟缭绕的竹篱茅舍,以利益追逐为目标的商品交易代替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礼仪,一些人感到失落,感到异化,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有了对已逝岁月的怀念。因为儿童处在社会生活的边缘,较少受到成人社会的文化污染,人们很自然地将童心、母爱、自然放在一起,塑造出一种道德自然主义的审美尺度。不仅表现在以儿童为描写对象的成人文学中,而且被顺理成章地引到儿童文学中来。叶圣陶写于五四时期的童话许多就是专为批判、对抗正在兴起的社会现代化而写的。《稻草人》的第一篇《小白船》,讲述两个孩子乘坐小白船被风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蓝天白云,红花绿草,见人不去的小白兔和一个看似粗蛮但心底极善良的乡野人,完全是一个纤尘不染的世界,这世界和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眼泪》中,主人公满世界寻找同情的泪,但找到的只是虚伪之泪、幼稚之泪、穷苦之泪,最后还是在孩子那儿找到。《祥哥的胡琴》中,祥哥的胡琴纯朴美丽,在城里不被人欣赏,最后在乡间在清风流水中,在孩子那儿找到知音。

《大喉咙》中的“大喉咙”指工厂的汽笛,一个典型的现代工业的符号,在作品中却因打破了人们的美梦而受到怨恨。尤其是《克宜的经历》,少年克宜从乡村来到城市,满目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可举起进城途中得到的魔镜一看,满街的人大头细腿,皮包骨头,手如鸡爪,面无血色,一幅艾略特笔下的“荒原”景象。最后作者还是让他重返乡村,在乡村的原野上去寻找他的梦。与叶圣陶同时期,冰心、周作人、黎锦晖、俞平伯等都赞颂自然、童心、母爱,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努力迈向现代化的背景上,形成一个怀乡、怀古、怀念童年的潮流。30年代以后,这一潮流由于阶级意识的勃兴而渐趋暗淡,但未完全退去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就再一次借寻根文学而重返中国儿童文学的大潮,上演原始主义在儿童文学中的又一次复兴。这和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一些作家目睹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提出重返自然、重返童年、重返中世纪的主张是一致的。

五四道德自然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旧时代中走出来的人们在对旧文化的主流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时,不期然地将边缘文化凸现出来以作为新文化的友军,妇女、儿童正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但如此凸现出来的边缘文化仍形成了对正在兴起的现代化的一种批判。和西方一样,中国的道德自然主义并不是产生在现代化全面展开、现代化的弊病明显暴露出来的时候,而是产生在现代化刚刚兴起、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现代化的时候,它的出现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可能是将睡将醒、将离开旧轨道又未完全离开时人们常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因为未完全离开旧轨道,对习惯了的东西充满留恋,对新的东西的缺点不仅敏感,有时还以夸张、放大的形式表现出来。童心、母爱、自然都是建构出来的,不管这个梦里的景象是否真的存在过,但清纯、美丽,还是给走向现代化和被现代生活弄得非常疲惫的人们以温暖和慰藉。

二、以荒野文化反抗园艺文化

道德自然主义主要是一种道德理想,从道德自然主义出发的批判主要是一种社会批判、道德批判。但儿童文学的主要读者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少年儿童没有很深入地进入社会,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

在人的成长。20世纪现代化的主题表现在儿童文学中,其核心内容便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有很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且是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变化的。五四反传统,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从西方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人的现代化;50年代普及教育,让许多贫穷家庭的孩子都能走入学校,是人的现代化;80年代,面对十年动乱的愚民政策,宣传知识、提倡个性,以知识、个性对人进行启蒙,更是人的现代化。20世纪儿童文学中反现代化的现代性,也从这儿表现出来。其中最集中的,便是80年代的新启蒙文学。1985年前后,启蒙文学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半是抗议半是逃避地走进历史走进文化走进民间走进荒野,兴起一个所谓的“寻根文学”运动。受这一文学思潮的影响,儿童文学中也刮起了一阵“野出去”的旋风。班马、常新港、沈石溪等等,写荒山大漠,写江南腹地,写山林古寺,写远山孤村,写活动在这些空间中半开化未开化的人,尤其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就连儿童文学中的动物,也由小猫小狗变成狮熊虎豹,一夜间变得凶猛起来。这里有对“十年动乱”将人机械化、工具化的反拨,有社会批判的性质,但更主要的,是透露出那代作家对当时儿童教育的不满,因为这些作品主要是对已进入新时期的社会现象而发的。十年动乱之后,一面是“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的需要,一面是现实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学生回到课堂,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文化大革命”前就受到批判的教育方式以一种变本加厉的方式重新回到教育中来。如果说这仅仅是特殊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理解和纠正或许并不特别困难,可问题恰在于,这里包含着历史发展、现代化进程中某些必然性的东西。在《立法者和阐释者》一书中,齐格蒙·鲍曼曾引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话,将前文明时代的文化称为“荒野文化”,将文明时代的文化称为“园艺文化”。荒野文化中的人一代又一代地复制自身,无需有计划的管理、监督和专门的供给;而园艺文化却只有靠专业阶层的培养、管理才能延续。“现代化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1]园艺文化自有园艺文化的长处。计划、管理、精耕细作,尤其注重对人的理性的培养,而理性恰是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但也因为过度地设计、管理、培养,过度的理性化指向,这一培养人的

方式容易过分受教育者、管理者意志的制约,人的成长按教育者、管理者的预设一步步地进行,人被苗圃化、格式化,失去自由发展的空间,失去生命的活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批判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人的觉醒、人的改造运动。鲁迅疾呼“救救孩子”,周作人等力倡“儿童本位”,从人教育、成长的角度看,就是要用儿童的未受规范的自由精神拒绝、校正已经僵化、异化、格式化的成人世界。“十年动乱”后人们又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人们又一次遇到相类似的状况。在班马写于1985年的《六年级大逃亡》中,李小乔在小学毕业前夕主动辍学,跟几个大人到外面去贩黄鱼卖西瓜,他之所以离开学校,并在与别人的谈话中声称自己“恨学校”,就在于他觉得现在的学校生活中“包含了根本的不良之物”。“学校根本就不是学校呀!它像一个大工厂,什么都像工厂那样管着……”就是说,当今学校是像生产物质产品如生产一台机器甚至机器上的零件那样生产人的。这里,我们显然又听到欧内斯特·盖尔纳和齐格蒙·鲍曼等关于“园艺文化”的论述。只是,以生产机器、机器零件的方法生产人比一般的园艺文化更野蛮,更机械,更易将人体制化、格式化。作为对这种生产人的方式的反叛,班马主张“野出去”。在《鱼幻》中,作者让笔下的少年离开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沿黄浦江逆流而上,一步步走进江南腹地。刚离开上海时,少年面容苍白,身体纤弱,见到一条水蛇也会吓得惊慌失色,但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不仅皮肤晒得暗红,来自心理遗传的原始密码似乎也被激活,不知不觉间唤回原始的灵性,能与动物、植物相通,有了自然的野性和生气勃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人的本我、潜意识的发现和尊重。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系统包含本我、自我、超我,一个健康的人格应是这三者的合理组合。“园艺文化”强调理性、强调超我,本我处在一种被压抑状态,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单维人”。“单维人”是片面地拉长人格系统中的某一维,将立体变成平面,使人“偏枯”,使人失去有机性,可能适合某种体制但不是人的和谐、合理的生存状态。而这恰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生存状况。以荒野文化批判园艺文化,正是对这种生存状况的揭示和反驳。

三、以唤神精神反抗祛魅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古代文化、古代文学是充满神魅特征的。原始人不能很好地区分物我,以己度人,以己度物,把在自己身上获得的经验推广到外物,使外物皆着我之色彩,出现“万物有灵”,如此想象出来的结果便被称为“神话”。人们讲述、接受这些作品,便有一种与神相通、接受神启的感觉。原始社会以后,人智渐启,有这种信仰的人越来越少,但类似的潜意识还在许多文学接受中存在着。一些人就认为,观剧将许多人集中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空间里,很大意义上就是许多人共同参加一个仪式,共同经历一个与神共在的时刻,人的情感也在与神的互渗中得到塑造。在现代文学中,这种神魅性质还在。因为,现代文学多是从本质论出发的,只要认定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的本质,文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个本质,文学能够反映这个本质,文学就不可能完全没有神启的性质。但就整体而言,这种神魅性在现代文学中是大大地淡化了。现代社会标示的是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渗透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文学艺术活动中。现代文学强调的是欣赏。欣赏是清楚地知道对象的虚构性质的,是将对象放到一定距离之外,观照从对象身上反映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欣赏对象也就是欣赏人自身。这种欣赏自然是不会有太多神启性质的。至近年的后现代文学,则连现代文学仅剩的一点神魅性也祛除了。后现代文学强调的是消费,我花钱,我消费,我是消费的主体,文学是我手中的玩具,对作品自然不存在任何敬畏之心。如一些后现代理论所说,人被召唤在广场上尽情地狂欢,娱乐至死。这种倾向也影响到儿童文学。但就整体而言,儿童文学,儿童对文学的阅读,还是更偏向唤神精神的。儿童和原始人、半开化的乡野人一样,思维天然地具有“我向性”,将外在世界看作自我的扩展、延伸,不是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看作“我一他”而是看作“我一你”关系,和世界本能地具有一种亲和性。这使他们的文学阅读本能地具有天真性。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深入地探讨了当下文学的处境,意识到大众传媒语境下文学的危机,但没有像许多人一样完全地陷入悲观,而未陷入完全悲观的理

由,恰在他相信这世界还有超越娱乐、超越消费的精神需求,那就是孩子们的阅读、孩子般的阅读。作者称这种阅读为“天真的阅读”。“我对第一次阅读《瑞士罗宾逊一家》时的天真的轻信,有一种忧伤的怀念。那是一种已经失去、永远无法收回的东西。除非你已经做了这天真的第一次阅读,否则不会剩下什么让你去抵抗和批评的。如果自觉抵制文学的力量,书首先就被剥夺了对读者产生重大影响的机会,那么何必读呢?”^{[2]229}“要想正确阅读文学作品,必须成为一个小孩子。”^{[2]176}这是对文学阅读说的,但也不完全是对文学阅读说的。如果我们对文化、对真理、对世界全无敬畏,全无神秘体验,一切都是游戏,一切都是解构,会不会走到虚无、玩世不恭的道路上呢?近年的儿童文学,至少是儿童文学的相当部分,还是坚守着文学的唤神精神的。一本《365 夜》,自 1980 年出版以来一再重版,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从传统的民间故事改编的。在遍地电视剧、遍地歌舞晚会、遍地卡拉 OK 的今天,仍有人在火炉旁,在南瓜架下,听老祖母听妈妈讲那遥远的过去的故事。“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手拉手……”人们似乎又被带到天地开辟、世界空蒙,物我界限泯灭,人和外物融为一体的境界,一种无机心无戒备对谁都不设防的天真状态。即使是在今天的创作性儿童文学中,这样的作品,这样的美学追求,在儿童文学中仍是大量的,普遍的。班马的儿童小说,程玮的少女小说,黑鹤的动物小说,王立春的儿童诗,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相对于现代人的理性、解构、反思、祛魅、游戏心态,这或许有点“反动”,当放在人类精神的现象学中,这“反动”中也不包含着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

四、以反现代的形式呈现现代性

反现代化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透过这层表现形式,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仍是 20 世纪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性”和“现代化”本是两个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概念。“现代化”说的是现代社会物质层面、社会组织层面的特征,“现代性”说的是现代社会精神层面的特征。社会的精神特征,特别是具体作家的创作,和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的组织方面的特征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20 世纪儿童文学中许多以反现代化面貌

出现的作品并非没有现代性,而是以反现代化的形式表现现代性。20世纪儿童文学中的现代性所以常常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化在极大地改变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的理性空间的时候,也压抑了人的感性,抛弃了社会进步的清洁精神,人们在文学中对现代化的这些侧面进行批评是合理的必要的。这种批评不独有于儿童文学,但在儿童文学中则表现得更为集中,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这种文体的一种特征。因为如大卫·帕金翰等人所说,人们是在成人、成人文学的否定意义上使用儿童、儿童文学这些概念的。在20世纪初儿童文学刚走向自觉的时候,人们迫切需要将自己和传统区分开来,于是把传统、把历史、把儿童、把儿童文学建构为“他者”,自己作为现代人、作为现代社会的成人,已从传统、儿童中走出来,是在与自己、与成人、与现代社会、与现代化相对的意义上谈论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在大多数时候,人们是从正面、肯定的意义上谈成人、现代社会、现代化的。这时,儿童、儿童文学就成了一个被否定被贬抑的对象,说儿童是幼稚的、浅陋的、无知的;说儿童文学是浅显的、简单的、寓言化的。但是,当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去看现代化,去看现代的成人社会,更多地注意到现代成人社会的腐朽、机心、功利、过分理性化的时候,儿童、儿童文学中的单纯、天真、快乐、美好便作为很正面的价值呈现出来,一些人甚至幻想将其作为一种校正成人社会的异化的力量。这正是我们在前面的评述中已经看到的状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肯定儿童文学中反现代化的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维柯说:“人

类事物或制度的次第是这样:首先是树林,接着就是茅棚,接着是村庄,然后是城市,最后是学院或学校。”^[3]已从森林中走出的人们不可能再回到森林中去,但在都市感到漂泊的无依时会想起森林、想起故园。这是一种两难,也是一种宿命,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就注定要在这种两难间挣扎,文学也在对这种生存状态的表现中获得自己的空间。

这种表现对儿童文学不全是正面的。一方面,儿童文学因这种表现获得深度;另一方面,这种表现主要是从成人出发而不是从儿童出发的。成人经历了社会的腐败、堕落、钩心斗角、追名逐利、异化、漂泊感,于是回想到童年的单纯、美好、无机心,于是有了对现代化的种种反思。这些反思会抬高童年、儿童的地位,但在很多时候又是与儿童自己的文学阅读、与儿童自己的精神成长距离较远的。这或许就是五四以来一些写乡野、写童心的作品艺术水准较高,但在儿童中却常常得不到热烈响应的原因。不过,这不是绝对的,现代社会的异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对现代化的反抗是一种普遍的情绪,以反现代化的方式表现现代性在整个文学中都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只要分寸把握得准确,这种表现方式是可以获得自己的空间的。何况儿童也会长大,儿童文学也不是只对儿童说的。

[参考文献]

- [1]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
- [2]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 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08.

